

馮玉祥書叢之貳

我的生活

【下】

馮玉祥

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馮玉祥書叢之貳

我的生活

下

馮玉祥
著

馮玉祥將軍自述歷史的一部經典書。



從青縣降生寫起，年少清貧從軍，深州高舉義旗，興兵護法討
袁，力挫辮子軍張勳，首都革命逐廢帝，五原誓師討軍閥，至北伐勝
利止，重大事件逐一記錄在案，再現了當年的風雲變幻。

這是一部清末民初政治、軍事生活的大百科讀本。

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的生活 / 冯玉祥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0.9
ISBN 978-7-5317-2489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冯玉祥 (1882 ~ 1948)
— 自传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5893号

我的生活 (上、下)

.....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
装帧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20×1020 1/16

印 张 / 39

字 数 / 495千字

版 次 / 2010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5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489-6

.....

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(二)

我们刚到常德，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。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。那时统计，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，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都因此变成肌肤溃烂、奄奄待毙的废人。我看着这种现象，心痛难言。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。乃和薛知事商量，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，而后再想主意。第二天即抓来六名。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，凡打过一针，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，接着就慢慢腐烂，不过半年工夫，即弄得体无完肤。这六个瘾客，已经遍体黑泡，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。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，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。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，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。

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。所中请了医生，制办药品，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，又派专人管理监视。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，也有自愿来戒的。在初戒的几天，他们痛苦欲狂，但六七天过去，即渐平复，一个月即完全断瘾。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，即取保释放。但继而一想，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，仍不免流于下流，流为盗贼。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，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。有学织布的，有学缝衣的，有学织袜的，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，确实可以养活自己，才让他们自由。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，办到第七班上，戒

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。

一天，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。说他有两个儿子，都打吗啡针，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，但他们死也不肯，她不知如何方好，说着满眼含着泪。我安慰她说：“老太太你不要伤心。这事交给我，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。”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（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），严厉训斥了一顿，送入戒烟所去。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。只两个月的工夫，那兄弟俩已经养得白白胖胖，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。我把那老太太找来，欢欢喜喜地把他们领去了。戒烟所中的瘾客，像这样的最占多数。

至于贩运烟土的事，查办亦严。各地驻防部队，都指令严缉。因此常常大批大批地拿获。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，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，外用洋铁封固，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，叠藏其中；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。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。查得的烟土，都解常德，后积至数万两，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，在西门外空地上扫数焚毁。

我到常德，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。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、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。后来我打听，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。街上一发现乞丐，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。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。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，心里极是高兴。一天，我到那里去参观，可是使我大大失望。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，大半坏了，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人占极少数。大多数的人——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，无所事事。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，而且多是腐臭了的。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，简直不如猪狗。因此有许多逃跑的，逃出来了，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；逃不脱的，耐心待着，死亡率惊人的高。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，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，务要赶紧设法改善办法、改善设备、改善待遇，若是这样的办，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，哪里是办公益呢？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。这样说了一顿，才着手改良。我离开常德之后，又

不知情形如何了。

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，许多大商店出票，电厂亦发票，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。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，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，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。我所至之地，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。我们清理得很快，也妥当，人民都说办得好。

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，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。如教勤劳、教忠勇、教仁爱等，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。后来听说民国十九年时完全被人毁去，不知弄到哪里去了。石柱子二尺见方，石亭亦简单适用。很好的东西，任意地去毁坏他，真是可惜。

常德城里的街道，经数次拨用罚款，翻修一新。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。那些道路都太窄狭、太崎岖，平时不便行旅，一旦有事，更不便运输。但是经费无所出，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，决不能采用，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。并由邓鉴三、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，凡公路所经，占用之地，悉免粮税，凡被占过多者，必须给予地价。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，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、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，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，做得平坦端直，如今日的公路。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，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，都喜欢得不得了。

从常德至德山以东，那边有一座大石桥，年久失修，早已塌坏。这也是一条要道，行旅至感困苦。请人估计石料后，亦动员部队修筑，做得很坚牢，并不比石工做得逊色。

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，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，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。他们指出来，只要我能力所及的，无不尽力去办。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、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。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，山洪暴发，沿江水位高涨，往往平岸，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，至为危险。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，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。但

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，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，都以经费不敷，不能实行。我和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出人工，只须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，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。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，当即计划修筑。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，始告完工。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，常德即发大水，水濒城头，人们立在城垛上可以洗脚，但常德终未受灾，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。

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常德居民，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，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。如南门外的江岸边，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，洗衣、洗菜、洗马桶、倒垃圾污秽，无不在此，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。中国临水城镇，都是这样，常德自非例外。这是最不卫生的事。我觉察此事之重要，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，从岸上搭跳板，凸达河中五六丈，远出污水范围，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。又因江水涨落无定，乃派人专管其事，随时更张。这等事关系太大，而办理亦并不难。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，江边仍留旧迹，但跳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。

我动员部队，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，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谢。其实这本不算什么。人民出钱养兵、养官，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，还不是十分应该的吗？为人民做工服役，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，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，有没有这种朝气、这种精神，以为士兵表率。若是官长暮气沉沉，根本没有此心，那自然无事可做。到了今日，许多军队进步多了，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。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，就算得很好的军队；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，还是稀奇少有。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，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，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。再说士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，愈不用愈萎靡，若日久闲散，懒惰成性，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，而且也毁了自己。

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。另一方面，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，也未尝一日懈怠。那时局面动荡，政治腐败，当轴握政者只一心对内，排除异己，扩张势力，谁也

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，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。我在常德住着，头脑是清醒的，认识是明白的。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，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。这不是容易的，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，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。要做到这个，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。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，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。

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，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。设种种奖惩的办法，从事严格训练。此外又扩大军佐队，凡在军中的人员，都一体参加，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（老拔贡）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，因年老体衰，未令加入，此外没一个人可免。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，其余一体参加。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，由参谋处规定课目，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，每月一小考，三月一大考，年终一总考。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，得改入军官队，并令其统率队伍。他们初练时，很觉不便，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。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，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，也能盘杠子，拿顶了，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。后来每至军官会操，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。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，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，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“官佐体操团”。

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，和士兵一样，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。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，高八尺，厚二尺，一连八道，每道相距十五步。跑的时候，须一跃而上，跑过一道，又来第二道。练到纯熟时，可以用手一按，身体就跳了过去，毫不费力。这类较激烈的课目，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。

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，自官兵以至伙夫，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，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，不停地连走七天。那时最常走的路线，是由常德至临澧，由临澧至桃源，由桃源再返常德。初时日行八十里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，一百四十里。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，风雨无阻。这不但磨炼体力，亦磨炼精神。



刘郁芬

刘郁芬、石敬亭分任教官。课目有战术、率兵术、地形、兵器、战史、筑城及典范令等项。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，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，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。后来提高课程标准，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。到一九二四年，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，改二年为一期，一直办到十六期。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，

门致中（1889—1951）山东济宁人，字靖原。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。后参加国民军，历任教官、参谋、团长等职。冯玉祥晋陕时任参谋长。1927年后任师长、军长。1929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七军军长。1931年任北平军分会委员、教育处处长。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主任。后任日伪华北治安军司令等职。1951年病死九龙。

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，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，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。平时多一次练习，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。

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，很是阔坦，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。除远途行军外，每至大雨之日，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。每绕一圈约有十里。城头上空气鲜洁，远望山河田原，景物至可怡神，故士兵们多乐为之。

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，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，内分两队：一为军官教导队，一为军士教导团。由团、营、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。

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，刘骥、门致中、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。

我部队中的官兵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，自幼失学，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。但怎样才算足够，这也没有标准。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，多识得常用之字，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。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。在常德的期间，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，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。

古文方面，多由《战国策》及《国语》之类书中选出，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。这些文，按官兵程度之高下，分阶段讲授。教授方法，一是讲解，二是背诵。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，记忆力低减，若不背诵，则过目即忘，亦不易理解，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。连长以上的军官，由我自己查考，背诵之后令其讲，回讲之后，再令默写。一次不熟，二次三次必须弄熟。规定五天读熟一篇，一月读熟六篇。每月一考：第一月考六篇，第二月考十二篇，以次递加。比这个较高的，有一汉文研究班，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，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，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，皆史记中摘选出者，以为读本。程度较低者，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《战阵一补》令其熟读外，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，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。

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，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，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。虽然进行很是迟缓，但选习者均有精神。

此外又设一工艺班，分木工、铁工、照相、修枪等数种。规定每个官佐，至少须习一种。先询各人愿习何种，而后分组请人教授。当时选习木工、铁工及修枪者居多，故成立大组。我自己学的是修枪，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。受伤残废士兵，亦须学习一种技艺，体力不足者，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。

那时的陆军规章，凡士兵从军三年，即当退伍。这个规章无人遵行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，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，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。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，中国农村普遍破产，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，方大量地投军入伍，以谋出路。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，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。一旦退伍，即无法生活，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放枪瞄准的一套，而流为匪盗。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，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。“三年退伍”的办法，

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，是适合的，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，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，即格格不入。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，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，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。试思士兵们之投军，原多是为的救国，亦为解决生活问题的，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，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，这种的办法，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，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吗？

为试办退伍，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。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，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，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，委韩多峰专办此事。又后，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，不能兼顾，乃又委李圻为厂长。厂中分织袜、缝纫、织毛巾、编藤器及纸工五科，后来增设一印刷科。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，在常德二年的工夫，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。后来我在信阳驻防，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，都能成家主业，自立自给。

我们治军的人，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，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。这句话看似容易，要真正做到，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，方有效果。苟不然者，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，退伍后为游民匪寇，脱了军籍，即入匪籍，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。

这期间，还举办有夏令会。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，生活紧张劳苦，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，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。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，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，山水清幽，地方凉爽而恬静。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，每天吃四顿饭，常请名人讲话，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。全体官佐，分为两班，轮流换班，四星期一次，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，都显得兴高采烈。我觉得这个夏令会，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。

官兵们有暇，还练习泅水。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，必须娴习此道，非徒增进健康，且所以获得技能，于作战时、遭遇意外时，都极有用。有一次，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，到常德传道，我

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。他年已六十余岁，曾在汉口泅水过江，把衣服脱下，拿在手中，游到江那面，再穿上衣服。他到了常德，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，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。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，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，又泅了回来，还觉得不过瘾。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，见者无不叹服。一个民族的强弱，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。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，给予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。

我那时于公余之暇，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。教的是军事体操，如利用地物，目测打靶等。常由营中借真枪去，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。常常对学生们讲话，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。说要救国雪耻，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，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，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。每星期教课数次，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。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，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，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。

一日，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，和我见了面，就向我请假，说不干了。我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不能干了。原来他从北京回来，经过彰德府，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，彼此相熟，说了几句。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，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，就回家买了数顷地。人家是天天打牌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。而在我们这里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。宋良仲说：“你看，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，怎么做人？”又说，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，什么也办不通，领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，和军需司、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。他们办公，就在窑子里、饭馆里，打牌、喝酒、躺烟灯，和人家打熟了，无话不可说，无事不可成。但他出差，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，到了北京，没处摸门路。“你看，这种情形，叫我办什么事？”

我只得安慰他一番，叫他不要着急。

他说：“您若能出些本钱，让我们把枪弹领来，怕不把这批

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！”

说的时候脸红耳热，气得嘴唇只打颤。我说，只要你办得到枪弹，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。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，他就可以有办法。我给了他八百元，他重新上北京，住了数月，果然把枪弹领来。第一次领枪二百支，子弹四十万；第二次领枪四百支，子弹一百万。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，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。那时在北京办事，就是这样的情形！

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间，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，又起新的变化。自民国六、七年间，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、主战的意见不同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、皖派的分裂。其间，直派领袖冯国璋（冯死后，曹锟、吴佩孚、李纯等继为首领）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，但毕竟裂痕宛然，实际言之，是直中有皖，皖中有直，直派、皖派的名目，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，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。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，横行恣纵，不可一世。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，作种种扩张自己的势力，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。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，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，由徐又



北洋皖系军阀靳云鹏

靳云鹏（1877—1951）山东邹县人，字翼青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。在云南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。1911年蔡锷在云南发动新军起义时，他在昆明五华山战败，化装逃走。后受袁世凯信任，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，升任山东都督。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，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。这年任陆军总长，代理国务总理。皖系失败后，又由奉系支持再任总理，至1921年直奉战争爆发前去职。后寓居天津。

铮、曲同丰统率。欧战告终，改参战军为边防军，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，由段自兼，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。其实所谓边防军、西北军，统是扩张自己，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。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，始则不按期发饷，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，再减而为六成、四成。越是认真训练，纪律良好的部队，

越是不发饷，以使之消灭；而那种收容土匪、鱼肉百姓的部队，反倒特别优待。这都显然是有所用心的。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，凡稍碍他们眼的人，必除之而后甘心。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，并不免其职，亦不宣布其罪状，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。这种种做法，狰狞猖狂，咄咄逼人，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，自己只有死路一条。

再有一件，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：当护法之战时，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，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，直打到衡州。若论功行赏，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，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。这样的做法，显然是直派打仗，皖派做官。

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，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。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，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。吴即撤兵北上，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。

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。这，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，人民受难忍之苦，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，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，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，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，陷在夹板缝中，痛心疾首，而又无法摆脱。而另一方面，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。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，若不这样地彼此残杀，自相消灭，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？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？

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，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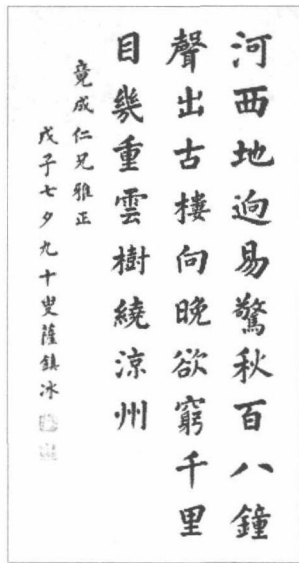


谭延闿

谭延闿（1876—1930）湖南茶陵人，字组庵，光绪进士。1909年，被推为湖南諮议局议长。1911年，与汤龙等人发起立宪友会。辛亥革命时，杀害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、陈作新，篡夺都督职位。1912年加入国民党，任湖南支部长。“二次革命”时，阻挠湖南反袁。此后，历任湖南督军兼省长。1926年，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。1927年后，依附蒋介石，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长等职。1930年逝世。



萨镇冰



萨镇冰书法

萨镇冰（1858—1952）福建福州人，字鼎铭。早年在英国学习海军，清末任海圻舰长、北洋海军提督等职。1919年，任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。1912年，一度代理国务总理。1923年，任福建省省长。1927年后，辞职赋闲，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。1933年，曾助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。1949年，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。1952年4月在福州病逝。

方军赵恒惕、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，至此，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。

张敬尧督湘二年多，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。他用人的标准有三：一是本家，二是亲戚，三是同乡。所谓“二帅”、“三帅”、“舅帅”、“姨帅”之类，充满了督军府，布满了全湖南。湖南人有谚语：“会说霍邱话，就把洋刀挂。”实非夸张之词。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，无廉无耻，无法无天，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，恣意搜刮以供淫乐。所统军队，比土匪还坏，对民众奸淫抢掠，无所不为，反正没有顾忌，没有约束。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，没法能够忍受，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，请他设法勒制，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。可是我们越是说，却越使段先生怀恨，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。

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，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。有的杀猪宰羊，以为劳军，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，人民就用菜刀、铁铲之类一一砍杀，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。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，实在是应该的！

张敬尧军退到岳州，沿途烧杀淫掠，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，纷纷到教会中躲藏。张军知道，冲向那教会搜查。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，

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。这事传出去，激起美人愤慨，当派武力前来镇制。那美舰从上海起碇，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，

显其威风，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，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。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，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。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。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，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，反倒欺凌之、虐杀之，而驱之托庇于外人，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，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。这样的军人，还让他高高在上地当督军，是什么缘故？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。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，张敬尧托他的亲戚贾凯璋来央及我，请我通过教会关系，去和美舰说话。我说：“这没有话可说，你打死了人，只好你姓张的拿命去抵！”

赵、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，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，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，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，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，孙已复电表示同意。并把原电转给我看，叫我只管安驻常德，不必移动。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，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，使我欣慰极了。

赵、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，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。因留少数在常德，其余都布置出去。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，各不相犯。一日，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，说该方面南军进迫，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，



赵恒惕

赵恒惕(1880~1971)，字炎午，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(今衡阳市衡山县)人。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1905年加入同盟会。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。武昌起义后历任新军旅长、军长等职。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判刑，获释后任湘军师长、湖南水陆军总司令。1921年4月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，次年春反对北伐军入湘作战。1926春天，衡阳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，赵恒惕情知难敌，自己向省议会提出辞呈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。日寇占领上海时，曾动员他出任伪职，赵恒惕严词拒绝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。1949年去香港，后去台湾，1951年任“总统府资政”，再也没有回到湖南。

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，

仍继续前进，恐有决裂之势。那时冯为连长，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，我颇不放心。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，夜间开了去，天明又转回常德，天天如此，以防万一。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，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，请即让开防地，以免杀伐。冯不肯屈服，回信说，我奉令在此布防，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，决不擅离防地。南军又来信说：“我们有三四营之众，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。”冯复信云：“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，你们休想前进一步。”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，南军因即停驻，终于未敢进逼。

不久，北京政府给我命令，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。我接到命令，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，先到津市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。我乃先发一电，将我奉令移驻湖北，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。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，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。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，很是诧异，以为军队行动，当如何机密，怎么不用密码，倒用明码。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，并来电问此真相。陈先生发觉此事，难过得不得了，连说“该死！该死！”立刻向我引咎辞职。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，不是有心之过，百般安慰他。我说：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。”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，一面办事却更细心、更发奋了。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，瘦瘦的，个儿不高，学问深到，为人诚实义气，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，给我的帮助很多。我至今想起他来，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。

赵炎午和谭组菴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，先打电报来，继又派代表带着信，送来几艘轮船，许多湘绣，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，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。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，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，我和那代表说：

“这个钱我不能受，我们是国家的军队，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，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。我若受了这个钱，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。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，和赵先生、谭先生见了面，他们必定指我脊领，和人家说，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……”